

“现代化进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康 庆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弘扬和继承“五四”爱国主义、科学与民主传统,反思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于5月5日主办了“现代化进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综述如下。

一、对现代化的认识

钟年认为,现代化,在社会学中指的是一种人为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在现代化理论中,人类社会被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类,各自被赋予不同的特征,最终是现代取代传统社会。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运动的成就是明显的,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目标的同一,使人类社会成了标准化、规格化的社会。

王齐洲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范畴,它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尤其指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对科学技术加以吸收、利用,还要对某个民族的思想 and 价值观念进行摄取和发挥。

鲁西奇指出,城镇化也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水平及其速度是考察区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区域城市体系(其功能、市场网络、地理分布)以及单个城市的地理面貌也是发生变化的。

冯天瑜指出,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人们过去过多注重观念形态的演变,忽视了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变化,今后我们要加大区域的、社会生活的、个案的实证研究,使现代化不再成为只是知识精英分子的观点现代化。

二、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

陈勇认为,对传统的西欧中世纪为黑暗时代的

说法应进行再认识。其实西欧中世纪在技术创造、经济活力、人才培养等诸方面为以后的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与基础;中断的连续性为近代世界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为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了潜在基础。正是中世纪,诞生了一个新的欧洲社会。

李工真指出,传统文化很笼统,应该对具体国家作具体分析。德国和中国都遭到英法等强大工业文明的冲击,除了德国和中国的其他诸种差异性外,两国传统文化应付挑战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向西欧学习的是器的层面,德国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罗福惠认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尽管有地理环境、技术等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中日两国文化类型不同,中国是单一型文化,日本是复合型文化,与西方文明撞击之前,两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差不多。但是,后来两国的现代化道路迥然有别。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承担现代化责任的人才有差异。

李少军认为,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差异应从中日两国本身的差异来说明。首先,同作为后发展型国家的近代统一过程,中日两国所花代价相差甚大,这对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本国与外国的关系,日本是在走向世界化的过程中完成本国的工业化的,中国却不积极进取,致使经济实力萎缩,地位下降。再次,产业化问题,日本的产业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配合,中国的洋务派在社会基础方面缺乏实现的具体条件,片面地自上而下,遭遇的阻力极大。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的现代化传播主体不仅是精英知识阶层,而且面向广大国民,中国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现代化传播以外国人为主体,而且仅限于知识分子,现代化距离老百姓太远。

马敏从中国近代企业家穆藕初的经营观念看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他以为,中国近代以张謇为代表的

第一代儒商将儒家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经商只是手段。第二代以穆藕初为代表的儒商,对儒学更多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儒学成为经商的道德资源。第三代以卢作孚为代表,调整传统伦理,完成了由儒到商的转轨过程。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变,贯穿着西方文化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去适应西方文化,这就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

郭齐勇认为,在肯定“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对其进行反省与超越。首先,“五四”主流思想家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对本土诸文化资源大体上取拒斥的立场。其次,思维的单维性导致了价值的单向度及平面化,致使现代化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之本土资源的发掘工作,仍是当前的难题。最后,“五四”本来是多元主义的时代,我们应该放开思想和心量,促进各思潮交叉互动,克服文化幼稚病,扩充启蒙内涵,改善启蒙心态。

三、中国现代化的殊异性

郭齐勇认为,文明的创造离不开传统,创新建立在活的和发展的传统之上。林毓生主张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使之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保持文化的认同。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需要精密与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传统辩证地衔接。这一主张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反响。

王齐洲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为例指出,虽然本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向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转换,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与西方文学一样的形式特征和理论话语,但同时也使中国文学丧失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丧失了与西方文学对话的平等权力。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学史学科的现

代化,必须尊重中国人的传统文学观念,从中国文学发展实际出发,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气息,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反映时代精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新体系。

郭莹认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主要范畴,如宽、恕、中、诚等无不包含着精彩的内容,足以显示中国传统处世智慧的文化价值及在当代文化重建中的应用价值。但作为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建立在血缘与拟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是格格不入的。

周积明就严复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而提出以下认识:①中国现代化走向内缘性发展道路;②强调人的现代化;③走渐进主义路线;④坚持效果论,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标准。

姚国华认为,中国本世纪现代化运动从中国大学的历史可以窥见一斑。北京大学、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不仅是育人机构,且代表、反映不同时期精神思想的总体面貌,成为先进思想的发源地。现在的大学,只是为完成某一社会需求而设的工具机构,已丧失思想的意义。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真正的大学开始。

本次研讨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的师友切磋、学友研讨的学术气氛。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人文论丛》2000年卷,将以“现代化问题”为专辑,集中有关现代化、中外现代化比较、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现代与传统等宏观或个案研究成果。这一专辑将特重细节研究、区域研究、关键词语研究、比较研究等实证研究成果。

作者:康庆,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97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吴友法)